

认为，两种说法过于偏激。在丹东后期有过错误，但不能因此一笔抹煞他的功绩。丹东称得上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英雄人物’，但决不能说他是唯一的革命家。”

第四，注意向读者介绍那些由于材料缺乏或因为重视不够而长期成为“空白”的历史人物。这一册介绍的人物，按其主要政治活动的时间，起自十七世纪中叶，截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从世界范围历史演变的主流来看，这是资产阶级兴起，进行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时期。这一时期内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等影响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因此，与这些重大事件相关的历史人物的介绍在本册中占较大比重是很自然的。尽管如此，本册仍以一定篇幅介绍了拉科齐·费伦茨二世、科希秋什科、里加斯·维列斯迪利斯、乔尔杰·彼得罗维奇、图帕克·阿马鲁、克里斯托夫·蒂拉登特斯、兰吉特·辛格、摩柯班都拉、扎希尔·欧默尔、恩津加、恰卡、丁刚等许多过去少为人知的人物。这就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历史，特别是被忽视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欧洲小国人民的历史。

第五，介绍了相当数量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如培根、霍布斯、洛克、巴克莱、休谟、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斯宾诺莎、笛卡儿、梅叶、摩莱里、马布利、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康德、黑格尔、安藤昌益、拉姆·摩罕·罗易。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了解这些思想家的主要著述和理论观点，而且便于考查重大历史事件的思想渊源。无疑，这也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此外，这本书为每个人物绘制了头像或有关的历史画面；在书中空白处，插入人名名录，图文并茂，增色不少。

当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读者比较熟悉，自然希望有更多的新材料写出他们的特色。遗憾的是有的重要人物写得不够生动，读起来比较枯燥；有的材料不够充实，比较单薄。另外，在选题上，还有该收而未收的情况，如法国大革命中埃贝尔派的领袖埃贝尔没有收入，该派其他人物却收了。另外，有些地方编辑加工还比较粗糙。所有这些，希望本册再版时能够有所改进，在《外国历史名人传》以后出版的各册中也能有所注意，使这部著作更臻完善。

隆美尔没有参与 七·二〇事件

——介绍戴维·欧文的

《隆美尔传》

宋钟璜

隆美尔是第三帝国的陆军元帅，希特勒最得宠的将领之一，但他又死于希特勒政权之下。战后的欧美历史学家对他和谋杀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的关系有不同的叙述和争论。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史书都认为隆美尔与七·二〇事件有关，说他参加了密谋集团，反对希特勒，是抵抗战士，甚至是民族英雄。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作了调查，于1977年发表了《猎狐》（1978年版德译本书名为《隆美尔传》）。他认为隆美尔始终忠于希特勒，未参加密谋集团，与七·二〇事件根本无关。同时他还揭破了隆美尔是抵抗战士的神话，引起了西欧史学界的一场辩论。原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等人对他的论述进行反驳，但欧文的答辩，报纸未予发表，于是欧文在法译本《隆美尔传》出版时在书末写了一篇跋语，驳斥斯派达尔的论点。

欧文指出，战争快结束时，人们开始把隆美尔和斯陶芬贝格为首的抵抗战士联系在一起，这确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4月隆美尔的儿子曼弗雷特·隆美尔揭示了他父亲的自杀是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两位将军到了赫林根的住家之后发生的。这本来已经足以说明相应的结论了。有许多高级军官由于参加这次政变献出生命。但是隆美尔一家还一直把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视为恶行，把对“元首”的忠诚视为一名元帅唯一正直的态度，所以人们把隆美尔与斯陶芬贝格联系在一起，似乎是有损颜面的事。1945年9月9日户齐厄·隆美尔（即隆美尔夫人）发表声明：“……我可以肯定，我的丈夫从未参加1944年7月20日的准备或活动，因为他作为军人拒绝走这条道路。我的丈夫始终真诚地对最高当局持有自己的见解、意图和计划，即使这对上级和领导来说并不是愉快的事。”但是密谋者的标签继续贴在隆美尔的身上。譬如，美国人总是迷信隆美尔的神话，以为他们所宠爱的纳粹分子肯定参加了反对他们头

号敌人希特勒的政变，因而把隆美尔描写成一位德国抵抗战士的英雄，而且把每一位可能插手导致隆美尔苏格拉底式的死亡的将军都要绞死。……

隆美尔作为密谋分子的神话渊源于霍法克上校和斯派达尔将军。霍法克在罗歇-基扬城堡会晤隆美尔后曾说，元帅已被争取过来支持他们的共同事业。斯派达尔在1944年7月20日前后虽比较隐蔽，但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在战后的年代里，他开始虚构隆美尔抵抗战士的神话。1946年连最愚蠢的德国人都清楚，战后的德国，只有那些被证明参加以斯陶芬贝格为首的集团的人才是真正反纳粹者并能担任要职。斯派达尔是隆美尔的参谋长。如果隆美尔被打扮成可敬的抵抗战士，那么，斯派达尔也就能分享这一荣誉了。1946年斯派达尔对另一名德国将军公开承认：“我想把隆美尔变成德意志民族的民族英雄”，欧文还指出，斯派达尔从俘虏营被释放后在他的著作中捏造事实：“1944年以后，即斯派达尔当了隆美尔的新参谋长以后，排成四行的密谋者涌进罗歇-基扬城堡大门。在那里，隆美尔热烈欢迎他们，保证他对他们的计划和图谋的支持，愿意在推翻希特勒后接管政权。”欧文指出，“这段描述缺乏任何依据。反之，隆美尔的私人信件和当时的参谋军官以及弗里德里希·卢格和赫尔莫茨·兰格关于隆美尔的言论，即使隆美尔竭力反对希特勒的决定，也表明他在整个时期对希特勒的忠诚。”

“隆美尔成了神话形象，斯派达尔凭借这种荣光的反照，从战犯爬到联邦国防军的新司令，后来又成为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军的最高将领。卢格也同样成为联邦国防军的总监。”“隆美尔在1944年6月中旬已认识希特勒的罪恶体制。从卢格的编写日记中，我们知道隆美尔开始谈及他的疑虑。他谈及纳粹搞的‘大屠杀’的报道和枪决五十名从萨冈俘虏营越狱潜逃的英国空军军官并怀疑希特勒手脚‘不干净’。当诺曼第战役对他日益不利后，隆美尔开始有些梦想，想违背希特勒的命令，直接和敌人谈判。但是，他也许清楚，他决不能真的这样做。……1944年6月，他亲自对希特勒提过两次意见，认为‘作出结论’的时候到了。7月，他发出了严正、明确的最后信件给希特勒，力争克卢格陆军元帅在希特勒面前联合进谏。其他还有《致蒙哥马利的信》，向敌人‘打开’诺曼第战线的想法，为对付苏军组成英美德联合行动的天真想法，所有这些设

想只是他的梦幻，只是偶然出现在他和亲近的人的谈话中。但当布格道夫和迈赛尔于1944年10月到赫林根他家时，他当然无法把这些谨慎的论点为自己开脱罪责。”“隆美尔曾经陷入听从良心的差遣和听从对希特勒忠诚之间的矛盾的内心中，对这一问题，在战后年代里，反映了尖锐的分歧意见。”

戴维·欧文文章发表后，斯派达尔在《法兰克福汇报》和《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反驳。欧文对此逐条驳斥。隆美尔的儿子、西德斯图加特市市长曼弗雷特·隆美尔对欧文的著作作了如下解释：“我父亲自1938年后倾倒在希特勒的魔术之下，这是对的。这不是新事。任何人都不会有异议，否则他在1940年法国战役和非洲战争中毫无顾忌地作战便是不能理解的。只是我父亲对希特勒作了完全错误的认识。我父亲认识真相却是相对地晚了。”“我父亲肯定不会把自己看作柏林抵抗运动的成员。他确实也不认为这个抵抗运动会发动一次政变。对斯陶芬贝格的密谋活动，我父亲事先一无所知。”“我父亲确实相信，责任全在他身上。如他不行动，不会有所作为。我父亲从1944年年初以来和抵抗运动的各界成员谈过话是肯定的。我父亲在1944年夏进犯后要求在法国停战，以便尽可能把英美法军队引向东线进击，这也是肯定的。如果成功，几百万人的生命可以得救，德累斯顿还会存在，许多其他城市亦然。”他还说：“但是他决定，在必要时独自在法国停战。1944年7月15日的信件中，他要求希特勒从失败的进犯战役中得出结论，在这以后他确实不能再回国了。他把他的计划曾和他的将军包括党卫队将军豪塞尔和塞普·狄特里希都谈过。后者都向他暗示，如情况紧急，他们将跟随他而不跟随希特勒。我父亲并不寄希望于盟军和法国人一起对苏联进行一场战争。当然他也并不排斥同苏联会有一场冲突。他要求结束战争；甚至他冒着会牺牲他家庭的风险。他对自己的命运在所不顾。”最后他评述欧文这部传记时说：“戴维·欧文写了一部很有意思的书。但是他是过于相信文献。文献并不是一个道出真正的真理的源泉，在一个独裁专政下是根本不可能的。欧文过于把我父亲描写成一位忠诚的人。如果我父亲不是鉴于希特勒指使所犯的罪行而陷于绝望境地，那么他永远不会参与反对希特勒的行动。”